

中國歷史上民族戰爭的 評判問題

黃元起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國歷史上民族戰爭的評判問題

黃元起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引徵一些實際材料，對於中國歷史上的部族、民族戰爭的評判問題，作了比較具體的論述。書中分析了部族、民族戰爭的根源、性質以及它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並指出了評判部族、民族戰爭的應注意之點。本書可供教學工作者參考。

中國歷史上民族戰爭的評判問題

黃 元 起 著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紹興路54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開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張 1 9/16 字數 29,000

(原學曾生活版印 28,000 冊)

1956年9月新1版

195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8,000

統一書號：11074·71

定 價：(7) 0.15 元

目 錄

第一章 引言..... 1

評判民族戰爭是極複雜的問題(1) 評判民族戰爭的觀點
與方法問題(1) 有關民族戰爭的評判問題的錯誤說法(3)

第二章 部族、民族的由來及其戰爭的根源 7

從種族部落到部族、民族的發展(7) 部族、民族戰爭是
階級社會的產物(9) 部族、民族戰爭決定於社會的生產
方式與政治制度(12)

第三章 民族戰爭是階級矛盾與

階級鬥爭的特殊形式.....16

部族、民族的主體是廣大的勞動人民(16) 部族、民族
戰爭是階級矛盾與階級鬥爭的特殊形式(18) 民族鬥爭與
階級鬥爭的關係(19)

第四章 民族戰爭的性質及其轉化.....24

正義的民族戰爭與非正義的民族戰爭(24) 正義的民族
戰爭與非正義的民族戰爭的轉化(27) 民族戰爭對歷史
發展的客觀作用(29)

第五章 從偉大祖國的形成、發展

看部族、民族戰爭34

偉大祖國在世界上的地位(34) 歷史上的部族、民族戰爭
與偉大祖國形成的關係(35) 歷史上的民族戰爭與現代中

國民族革命戰爭的區別與聯系(37) 現代中國民族革命戰爭的偉大歷史意義(40)

第六章 結論——評判民族戰爭應注意的幾點……44

具體分析、全面觀察、重點掌握(44) 注意民族戰爭對各民族人民生活所起的作用(45) 充分認識現代中國民族革命戰爭的正義性(46)

第一章 引言

評判民族
戰爭是極複
雜的問題

近年來，不論學習中國歷史的青年同志或歷史教師，都感到評判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戰爭是一件困難的事。他們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如民族戰爭與階級鬥爭的關係如何說明；民族戰爭的性質如何判定；民族戰爭的性質在戰爭過程中會不會發生變化；如果會變化，又該如何闡明；民族戰爭對社會歷史發展的作用如何分析；等等。這些問題如果不加以解決，我們學習與講授中國歷史就會感到很大的困難。的確，中國歷史上部族、民族戰爭的現象是非常複雜的，其中充滿了矛盾；要把那些矛盾、複雜的因素，提到理論原則上來，一個個加以分析、作出判斷，使我們認識它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沒有長期的研究，是很難辦到的。但不管它如何困難，我們研究中國歷史的人或講授中國歷史的教師是有責任去逐步加以解決的。我在這本小冊子中，企圖把和中國歷史上的部族與民族間的戰爭有關的一些問題，特別是上面提到的問題，作較為系統的闡述。雖然這些意見很不成熟，但是我願意公開發表出來，跟史學界的同志們共同研究。

評判民族戰
爭的觀點
與方法問題

首先，我們必須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對於民族問題與民族戰爭的基本看法，是與資產階級的歷史唯心論或民族主義的觀點相對立的。資產階級歷史唯心論者或民族主義者，從其剝削階級的偏

見出發，常把部族或民族曲解爲超歷史或超階級的東西。他們認爲有了人類就有部族與民族的存在，認爲全部人類的歷史就是民族戰爭的歷史，認爲部族與民族間的壓迫與戰爭是永遠存在的，過去與現在如此，將來也不會消滅。他們還以種族主義或民族侵略主義爲出發點，提倡狹隘的愛國主義以及現代英美帝國主義所宣揚的世界主義，有意挑撥民族間的感情、製造種族間的分裂，以遂其階級剝削與壓迫的自私企圖。因此，我們在評判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戰爭的時候，必須堅決反對這些歷史唯心論或民族主義的錯誤觀點。不這樣，我們就會成爲資產階級的思想俘虜，對中國歷史上的部族與民族戰爭便得不到正確的認識。

其次，我們應當注意，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評判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戰爭有關諸問題，必須貫徹理論結合實際這一基本原則。這就是說，要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原則來研究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戰爭的具體情況，這樣才能得到正確的結論。偉大的革命導師列寧教導我們：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①。要做到這點，我們必須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史料上的問題。我們祖國有幾千年的歷史，先人給我們留下的文化遺產是很豐富的，特別是在史學方面。但中國過去的歷史學家由於階級立場的限制，往往抱着種族主義或民族主義的偏見，對於國內各少數民族的歷史情況，不但紀述得很少，甚至故意加以歪曲或抹殺，因而在今天，我們感到對國內少數民族的歷史知道的太少。而中國歷史上的部族與民族戰爭是

發生於漢族與其他民族之間或者是其他民族相互之間的，關於少數民族的資料掌握得少，就很難對這些戰爭作出正確的分析與判斷。在這方面，我們應當設法克服困難，例如，通過對有關的地下發掘材料和少數民族生活的研究，可以部分地補救史料不足的缺陷。另一方面，則是我們的理論水平問題。理論修養問題，絕不是讀了幾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與毛主席的著作，就能解決的；我們必須真正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實質，同時必須學習今天蘇聯在歷史科學上的偉大成就，從其中找尋研究問題的立場、觀點與方法，來解決我們的歷史實際問題。恩格斯說：“你嘗試用唯物論的觀點來分析問題，那我必得首先說明，不把唯物論當做研究歷史底指導的綫索，而把它用作現成的型版，杜撰剪裁歷史的事實以與它適合，那末唯物論的方法就變成它的反面了。”^②這就是說，如果我們不能深入體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而只是把理論當作教條或公式去硬套歷史事實或歪曲歷史事實，結果就會走上唯心論的道路。

總之，我們要評判中國歷史上的部族與民族戰爭的問題，一方面要掌握豐富的資料，另一方面要運用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具體地研究具體的情況。

有關民族戰爭的評判問題的錯誤說法

近年來，在歷史教學工作中，在分析中國歷史上部族與民族戰爭方面，我們常常聽到一些錯誤說法。例如有些歷史教師在講授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戰爭時，往往用國界為標準，來判斷這些戰爭的自衛性或侵略性。他們說在紀元前一二七七年以前，漢朝抵抗匈奴

的進犯，皆限於把它驅逐出國境，所以這種戰爭是自衛性的、防禦性的戰爭；到了紀元前一二六年以後，漢武帝主動地派遣大軍出擊匈奴，並深入匈奴腹地，因此，紀元前一二六年以後漢族對匈奴的戰爭便由自衛戰爭轉化為侵略戰爭了。

這種說法從表面看來，好像很簡單很明確，也好像評判民族戰爭並不是什麼難事；實際上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把國界作為評判民族戰爭之自衛性與侵略性的標準，我們不能不認為是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試看馬克思是怎樣分析普法戰爭的。馬克思說：“對於德意志方面，這戰爭（普法戰爭）是防禦的戰爭。”^⑤他之所以這樣說，不是因為這個戰爭在德國領土之內進行，而是因為這個戰爭所反擊的是反動的拿破崙主義的法國，是爲了德國的獨立，是爲了把德國與全歐洲從第二帝國腐爛了的羈絆下解放出來。但是同一普法戰爭，到後一階段，馬克思又說它變成了對法國的掠奪戰爭。馬克思這樣說，也不是因為德國軍隊打出了國境，而是因為當這個戰爭打出國境的時候，拿破崙第三出降，巴黎人民已經宣佈了共和國。這時德國進攻的，已不是反動的拿破崙主義的法國，而是法蘭西共和國了。馬克思分析普法戰爭，顯然是從當時社會發展的總趨勢、德法兩民族內部階級關係的具體情況來判斷戰爭的性質及其轉化過程。而我們有些歷史教師分析匈奴與西漢的戰爭，却單純用國界爲標準，不從當時整個歷史發展的總趨勢與兩族內部的階級關係來分析，錯誤是顯而易見的。

又如解放以後，有些歷史教師爲了批判大民族主義或大

漢族主義的觀點，在講授國內少數民族運動時，常常忽略了少數民族內部的階級關係；而是籠統地認為：凡是反對大民族主義或大漢族主義的少數民族運動都是革命的、正義的。他們把中國近代史上的回教反動統治者阿古柏的叛亂，說成是回教人民的起義，把阿古柏說成是代表回教人民起義的民族英雄。近年蘇聯學者對於中亞細亞各民族的歷史問題的論爭總結，有力地批判了這一錯誤看法。蘇聯學者指出：當時東土耳其斯坦的民族運動內部存在着兩種不同的目的，“以和卓們為首的封建主集團，在反對滿清統治的口號下，為恢復其被滿人削減的權利和特權、為爭取剝削本族人民的壟斷權而進行鬥爭。而人民羣衆——農民和手工業者則有不同的目的：他們的鬥爭是為了反對封建剝削、反對滿清官吏和封建主的專橫”。但阿古柏的國家成立以後，“由於阿古柏這種反動政策，東土耳其斯坦底經濟破壞加劇了，開始了人民羣衆底毀滅性的貧窮化、飢餓和瘟疫。奴役和貧困化了的勞動人民的賣身發展起來。買賣兒童少女成為常事。沒有一個普通百姓能夠確信自己的財產、家庭和生命的完整——一切都由阿古柏及其走狗們隨心所欲而決定”。由於東土耳其斯坦的阿古柏的走狗們的壓迫，“在許多城市中爆發了勞動人民的起義。例如，一八六七年初，由於推行新賦稅，在吐魯蕃發生了一次大起義，這次起義被和卓們殘酷地鎮壓下去了”。此外，“阿古柏本人是英國和土耳其的特務，以自己的政策來實現英國殖民者的利益。阿古柏的活動是反動的、反人民的，並給羣衆帶來了最殘酷、最野蠻的中世紀式的封建壓迫底變本加厲，而歸根結蒂，使東土

土耳其斯坦各族人民遭受英國殖民者的奴役”。因此，蘇聯學者的結論說：“必須指出在那個時期，在日益加劇的英國在東方的擴張的條件下，東土耳其斯坦之歸入大清帝國版圖，防止了維吾爾人民被英國奴役……這是一個積極的因素。”④蘇聯學者這一分析是正確的，因為他根據當時東土耳其斯坦各族的內部階級關係與英國反動的殖民政策而進行了具體的分析；而我們有些歷史教師只是片面地看到清朝統治者的大民族主義的一面，忽略了東土耳其斯坦的內部階級關係與國際關係的另一方面，因此所得的結論是錯誤的。

由此可見，我們分析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戰爭，不能簡單地以國界為標準去判斷它的性質，也不能形式主義地抓住片面的史料，輕下斷語。我們必須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根據豐富的資料進行具體的分析，從史料的總和中得出科學的結論。

① 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版）共產主義一文，轉引自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三〇〇頁。

② 恩格斯：給恩史特的信，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思想方法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〇八頁。

③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吳黎平等譯，解放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二四頁。

④ 沙赫馬托夫、基列耶夫：論英國殖民者的走狗阿古柏的國家底反動本質，見為正確闡明蘇聯中亞細亞各民族底歷史問題而鬥爭，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二一三——二三三頁。

第二章 部族、民族的由來及其戰爭的根源

從種族部落
到部族、
民族的發展

我們要研究中國歷史上的部族、民族間的戰爭，首先必須弄清楚部族、民族的由來。我們知道，人是類人猿在勞動過程中轉化過來的，人類在這轉化過程中，逐漸散佈於地球上的各個地區；由於各地區環境的差異，在不同地區生息着的人類，爲了長期適應其特殊的自然條件，於是外表徵狀上發生了若干差別，如皮膚、毛髮與眼睛的顏色，毛髮的形式，鼻、唇的形狀等等，這就產生了許多不同的種族。另一方面，在人類歷史的黎明時期，他們即以血緣爲紐帶，過着“羣團”的生活，接着出現了建立於血緣、氏族基礎上的人們的生活集團，如大氏族、部落、部落聯合、部落聯盟等等的組織。這種部落或部落聯盟的組織，既以血緣爲紐帶，那末血緣的關係與社會的聯系，自然是一致的。因此，我們將原始公社時代的社會聯系說成部落組織或種族均無不可。中國在夏殷時代以前，境內有許多的部落組織：如住在今河南與山西南部一帶的華族，住在北中國東部的夷族、西部的羌族、北部的狄族、南部的南蠻，顯然都是部落或部落聯盟的組織，也可以說它們是屬於不同的種族。

這種血緣的聯系，在歷史的進程中，逐漸被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出現、社會貧富的分化、商業的發展與土地所有權的轉移等等原因所破壞，它不再成爲

人們社會聯系的必需條件；而階級與國家的出現，更加速了氏族或部落的融合與歸併的過程。即由部落而形成部族，以後又由部族而演進爲民族。在部族時代，一些民族的特徵如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文化及共同的地域雖然是在形成的過程中，但是血緣的因素還有一定的作用。到了民族形成的時代，血緣的紐帶才完全失去了作用。這從中國歷史來看就很明顯。由於中國歷史的特點，農村公社與土地公有制的殘餘曾長期地保留下來，中國社會在秦漢以前，特別是春秋戰國時代以前，其血緣的因素還發生很大的作用，所以它只能發展到部族的階段。

世界歷史的一般情況是：各民族歷史上的部族聯系一直保留到封建制社會的末期；到了封建制社會沒落、資本主義制度上升的時代，民族才逐漸形成。但中國的歷史則具有自己的特點，中國境內以漢族爲主體的種族與部族，經過春秋戰國時代的融合，到秦漢時代已開始形成封建性的民族，而其他邊疆的一些少數民族仍長期停留在部落或部族的階段。范文瀾在試論中國自秦漢時代成爲統一國家的原因一文中，認爲斯大林對民族所下的定義中列舉的四個特徵：共同言語、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狀態，漢族從秦漢時起就具有了。所以他說：“漢族自秦漢以下，既不是國家分裂時期的部族，也不是資本主義時期的資產階級民族，而是在獨特的社會條件下形成的獨特的民族。它不待資本主義上升而四個特徵就已經脫離萌芽狀態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現實。它經歷過二千餘年的鍛鍊，具備着民族條件和民族

精神，所以，當歐洲資本主義侵略者侵入以後，一方面，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一方面，民族反抗運動蓬勃地開展起來。……”^①雖然范文瀾這個說法，目前史學界還在討論，大家的意見不很一致，但中國漢族自秦漢以後的生活情況，與歐洲封建時代的國家分裂的部族生活的情況，則是顯然不同的。

如果我們同意范文瀾的說法，那末，漢族從秦漢時開始形成封建性的民族，到鴉片戰爭以後由於歐洲資本主義侵入，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資本主義無法發展，因而資產階級民族也沒有發展起來。一直到一九四九年由於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獲得全面的勝利，中國各民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擺脫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的束縛和壓迫，而開始逐漸過渡到社會主義民族的新階段。

評判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戰爭，必然要遇到“民族”這個概念的問題，我個人的意見是不要太拘泥。在中國民族的形成時期這問題尚未得出科學結論以前，我們把中國歷史上的部族與民族統稱為民族，把部族、民族戰爭統稱為民族戰爭，還是必要而且是可以的。

部族、民族
戰爭是階級
社會的產物

如上所述，在原始公社制時代，人類社會的組織是“羣團”、氏族、部落或部落聯盟，當時人們過着共同生產、平等消費的生活。戰爭這個現象在那種社會裏是不存在的。蘇聯學者赫魯斯托夫對於戰爭的由來，曾有明確的闡述。他說：“在原始公社制度時期，沒有階級，沒有人對人的剝削，也沒有國家，因此也不知道有戰

爭，也就是不知道有爲了某種政治目的而進行的一種有組織的武裝鬥爭。那時既沒有武裝人們所組成的專門隊伍（軍隊），也沒有用以進行戰爭的專門武器。在個別氏族和種族之間雖也曾有過武裝衝突，但那是偶而爲了爭奪更好的狩獵地或畜牧場而發生的。這樣的衝突不是由原始公社制度的社會關係的性質本身來決定的。武裝衝突，只有在原始公社制度崩潰的時期，也就是只有在由於社會的勞動分工而出現了生產資料私有制，並隨之發生和開始形成階級和國家的時期，才帶有戰爭的性質。在這種條件之下，武裝侵襲就成爲剝削者發財致富的手段、取得奴隸的手段。……戰爭成爲代表壓迫者利益的正常的國家機能，成爲鞏固和擴大他們統治的手段，成爲掠奪其他民族的源泉。”②由此可見，在原始公社時代，那時尚未出現部族與民族，也沒有部族、民族戰爭；那些武裝衝突只是由於氏族或種族之間偶然爲了爭奪更好的狩獵地或畜牧地而引起的，並非由於社會關係的性質決定的、代表壓迫者利益的國家利用“武裝人們所組成的專門隊伍”，爲鞏固與擴大他們的階級利益的真正戰爭。以我們中國的歷史來說，在夏代末年以前，還處在原始公社時代，因而夏代以前的各個種族或部落之間的武裝衝突，雖然充滿於中國古史的傳說中，但這些都不是各族的壓迫者階級利用軍隊與專門武器爲擴大與鞏固其階級利益的戰爭。

有些人發生疑問：古代傳說中的黃帝與蚩尤的“涿鹿之戰”，黃帝與炎帝的“阪泉之戰”，規模都很大，難道都不是戰爭嗎？我們認爲，這些傳說雖然也暗示當時各族間鬥爭的劇烈，

但是很明顯，這種鬥爭不就是戰爭。這是因為“黃帝”所代表的黃帝族，“蚩尤”所代表的九黎族，“炎帝”所代表的炎帝族，都是遊牧的部落組織，他們族內沒有階級，沒有國家，也沒有專門組織的武裝隊伍。那時各族在北中國的廣闊原野上“逐水草而居”，各處流徙移轉，他們之間偶爾的武裝衝突，顯然是為爭奪當時黃河中游一帶較好的狩獵地或畜牧地，並不是為了某一族的壓迫階級的利益而利用國家與軍隊進行戰爭的。

只有到了殷周時代以後，我們才可以看到中國歷代各部族或民族的統治階級利用國家權力或軍隊，為擴大與鞏固自己的階級利益或為達到某種政治目的而進行真正有組織的戰爭。因此，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看來，戰爭或部族、民族戰爭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即到了階級對立的社會出現之後的產物，並非有了人類即有戰爭，中國的歷史如此，其他世界民族的歷史也完全是如此。這一點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爭論與資產階級的戰爭論的根本分歧點。資產階級的反科學的戰爭論的一派——生物學的戰爭論，把戰爭的原因看作是人的生物的天性。這一理論的提倡者利用達爾文主義，故意歪曲它並使之庸俗化，用以證明戰爭是生活的一種不可避免的表現，和動物界的生存競爭同樣是社會生活的規律。他們得出結論說，戰爭是各國人民生活中永存的、不可避免的而且有益的現象，以此來辯護現代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資產階級戰爭論的另一派——種族戰爭論，則以所謂“優秀”種族與“劣等”種族這種仇視人類的觀點出發，號召所謂“優秀”種族的人民去殘酷地、無情地屠殺“劣等”種族。這種反動的種

族戰爭論，爲希特勒匪幫與日本軍國主義軍閥所奉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英帝國主義者承襲了希特勒匪幫的衣鉢，力圖藉助於這種反動理論，在思想上準備和發動新的世界侵略戰爭^③。資產階級思想家迎合他們主子的意旨，製造出種種反動的、反科學的戰爭理論，竭力企圖證明戰爭的不可避免性和永存性，辯護資產階級國家的侵略政策，掩飾帝國主義戰爭的掠奪性，我們必須予以揭發。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爲：部族、民族既然是歷史發展過程的產物，那末，到了將來社會主義革命在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由於階級消滅，社會主義民族長期合作融合，民族戰爭也會自然地趨於消滅。

部族、民族
戰爭決定於
社會的生產
方式與政治
制度

人類社會發展到階級社會，共經歷過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三種不同的形態。在這三種不同的社會形態中，由於社會生產方式與政治制度的不同，各部族、民族間的戰爭的原因與特性也就各有差別。奴隸制國家所進行的戰爭首先是擄掠奴隸的基本手段，同時也是掠奪和征服其他國家的工具，鞏固奴隸主階級統治的手段；因爲奴隸制的生產方式與政治制度決定了奴隸主國家必然要以戰爭爲手段，來掠奪他族人民並擴大奴隸勞動力的來源。例如，殷代的奴隸主國家的對外戰爭，其主要目的即在於掠奪奴隸。殷代的文獻記載中，常以“有孚”或“罔孚”爲主要的事情，這說明了當時是以是否俘獲人口爲戰爭的主要目標^④；又如西漢初年匈奴族對漢族的戰爭，由於匈奴國家已進入奴隸制階段，所以它的侵略戰爭的目的，也以掠奪財富與奴隸爲主。漢書匈奴傳說：“其攻戰，斬